

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是每一个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重大使命。在发展进步的历程中,人类除了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成果外,不同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就是还创造出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行改变自己存在的客观环境,同时也非常突出地改变着自身。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因素。动物虽然也有感情,有思考,但只是初级的、低层次的,是难以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而人则不同,人类的感情更加丰富、深刻。因为人类自身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人类在发展的进程中思考的问题也更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也更多。在这种思考与奋斗之中,人类逐渐积累了许多知识、经验,并增强了自身的能力。它们不仅可以像其他动物那样凭借直觉、经验来处理面临的问题,还将通过对规律的把握来对事物的前景进行分析预测,从而决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一方面,人类需要坚守一些基本的原则,不断提升自己的品格,以更好地应对挑战,使发展更加顺利;另一方面,更需要正确把握前进的方向,不至于因为选择的错误而颠覆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以保证自己能够不断进步,能够更好地与自然协调关系,满足自身发展的要求。这一切,都需要人类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分析问题、把握问题的本领,以引领自己的前进。文艺作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是人类思想情感的外化。不同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是,文艺作品不是从逻辑的、概念的层面来表达人类对社会实践的认识,而是从形象的、情感的层面来表达人类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就人类文化成果来说,文艺作品由于其具有生动性、形象性,更容易被人接受,其社会影响更加广泛、普遍,受众面更大,接受的可能性更方便,从而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在媒体还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小说、戏剧等形式来接受其中所包含的价值选择。如我们可能更多地从这些故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诸如爱国、忠义等价值形态,它的特点是在生动的形式之中隐含着理性选择,是一种“隐接受”。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人类传播方式更加丰富、便捷的条件下,人们接受信息的手段更加多样,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可能性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人们不仅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成果,也有了借助于现代科技而新生成的文化成果。文化样式的复杂多样,使人们的创造性、自主性更强,而某一种文化产品被大量的其他文化产品淹没的可能性更大。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创作生产更

# 用优秀作品引领社会进步

□杜学文

多更好的优秀作品,增强优秀作品的影响力,用优秀的作品来引领社会的进步。

优秀的作品一定体现了正确的价值选择。衡量文艺作品的优秀与否,当然不可能用量化的指标进行。这就使我们对作品是否优秀,以及其优秀程度的评判产生了模糊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评判。至少,我们可以从作品表达的社会内容来分析其关注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从其艺术表达的生动性来判断其艺术水平;从其受众的喜爱程度、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及影响的地域广度来分析其影响力。一部作品没有好的表现手法,就失去了其作为“艺术”的特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部作品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法好,还是非常不够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人们不可能持久地对“形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是在对形式的关注后面更关注作品对自身面临问题的态度。所以,优秀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作者所感悟到的人类价值选择。能不能“艺术地”,而不是“非艺术地”在文艺作品中表达这种价值选择,是对创作者的考验。

我们创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些人回避在作品中进行价值表达。尽管他这种态度已经进行了选择,但表面上仍然要忽略或者否认这一问题。另一种现象是,由于创作者自身对社会分析思考的欠缺,表达了错误的、似是而非的价值选择。前者的疏离、回避,将弱化我们的精神追求;而后者将混淆是非,误导我们的价值选择。出现前一种现象的思想根源是泛娱乐化的结果。认为艺术就是要让人“娱乐”,要让人们从艺术中享受“游戏”的快乐。这一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是强调艺术作品的“艺术功能”,是对艺术作品概念化、抽象化、灌输化的一种反驳。但是,艺术作品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在让人实现“娱乐”的同时,还必须要在娱乐的背后隐含价值选择,体现艺术家对人生、社会的感悟与思考。这种价值选择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核心要求,也是艺术家创作的核心要求,更是作品的骨血。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正确的价值选择隐含在最大可能性的生动形式

之中,而不是为了形式丢弃了内容。出现后一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出发点、层面、方法不同,艺术家个人的教养、学识、经历不同,从而形成了某种选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是否对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感受与了解?自身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我们的表达能力与表达效果是否一致?举例而言,民主比专制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怎么理解民主呢?民主是体现人民利益,并由人民当家做主呢,还是仅仅体现在选举的方式上面呢?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是都是一种民主模式?如原始社会的原始民主,工业化初期的民主,现代化程度较高甚至后现代社会的民主能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吗?如果我们要表现对民主的追求,是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现实来抽象地表现呢,还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表现人们的努力呢?所以,用优秀的作品来引领社会的进步,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用正确的方法来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象、人物,以艺术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使正确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我们倡导的价值选择。

二

优秀的作品还将表达出艺术家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感悟。艺术家不一定像哲学家一样说出某种概念性的历史观点,但他一定要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有所体悟,从而让欣赏者从作品中得到教益。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必须对社会生活要有深刻的理解、认知。尽管这种了解与认知是从具体的人物、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但正因为我们在作品中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从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金的《家》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的日常生活,是从人物形象入手。但其深刻性正在于他通过一个家庭中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封建家庭以及由其代表的生活方式的破产,从而激发了人们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艺术性表达。这种表达来自于作者对旧式封建家庭生活,以及其代表的社会的深切了解。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

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解决得好不好,对国家今后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我们的作品如何表现这样的时代?如何表达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给人以信心与力量?还是让人迷茫、彷徨、抑或失去前行的力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是要表达最广大的人民的心愿的。我们只有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发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巨大的创造力,感受到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智慧、勇气、力量,体悟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并用艺术表达出来,激发起更多的人们的创造热情,提升我们前进的勇气。

要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正确的把握,除了要深入生活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方法不对,认识就不对。由于我们对生活的了解有局限,容易形成看问题的片面性、简单化。这种机械的方法影响了我们对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把握,容易一叶蔽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把具体的人、事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具体地分析观察。既要对“现在”了解,又要对“过去”有认知;既要了解“这个”,又要明白“这个”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不能就事说事,就人说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我们现实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还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从而否认我们前进的道路?如果简单地从问题出发,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我们借助于正确的方法,能够既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肯定我们努力的效果,从而激发人们解决问题的创造力,这是对社会进步的正确引领。

三

优秀的作品还必须表现出高尚的精神追求,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力量。文艺创作关乎人们的思想情感的

表达。它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同时,必然要体现出创作者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除了宏大的叙述外,更多的是表现人们的心灵、日常行为、生活细节的。它不一定涉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但涉及人们的言谈举止、情感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大量的、丰富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批判那些低俗的、丑恶的、虚假的东西,赞美那些高尚的、美好的、真诚的东西。受泛娱乐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人们在创作时比较多地考虑受众的欣赏需求,出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现象。语言粗俗、行为乖张、低级趣味、以丑为美的现象屡见不鲜,无病呻吟、制造噱头、宣扬情欲的倾向也比较突出。这种片面的迎合可能会赢得一时的经济效益,但终不会得到人们最终的欣赏,是艺术创作的死路。同时,也将消解人们的精神力量,出现价值观的误导。

艺术的意义在于表现社会生活的同时,塑造人们的心灵世界,用美来感染人们向真、崇善、求美。要用艺术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样的生活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样的生活追求是应该丢弃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们倡导、尊崇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应该鄙视、改变的。我们不一定都要在作品中表现宏大的生活场景,但却不可以放弃对美好境界的描绘、表达。事实是,更多的、大量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怎样对待生活、对待生命、对待他人、对待社会,是艺术家的责任。是让人们互相隔膜、疏离,甚至仇恨?还是让人们更加友爱、相互关心,相濡以沫?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对低俗的迎合,而在于对人们心灵的净化与提升。她是人类高尚情感的抒发器,是人类精神的塑造者。我们之所以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还希望能够得到艺术的滋养,是因为在艺术家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中,能够使我们麻木的心灵得到净化,疲惫的精神世界能够重新振作。总之,就是能够从艺术的世界中寻找回人类的尊严,进而激发出我们前行的力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人民群众期待我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用优秀的作品来引领社会的进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 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26)

# 小人物也可以挑大梁

□望见睿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铁血首义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专题的6部重要图书之一。

我惟恐我贫弱的文字难以复活英雄们声色壮丽的经典人生,无力再现那段叱咤风云的峥嵘历程。我的心情一直颇不平静,因为我深知我的笔力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我惟一自信的是我能尊重史实,书中的每一处历史事件都能在史书中找到出处,都能在现实的土壤里找到旧址。我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展示史学家公认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和这场革命的局限性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我还想说,一场历史性的非凡壮举,涉及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历史书也只能留其主干。所以,尽管尊重史实,客观公正,一直是我内心的一柄标尺,但虚构又是必须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之虚构又非虚构,而是掀开历史的尘埃,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从历史的废墟里翻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穷尽那些为武昌起义默默牺牲无私奋斗的人们。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是永远的遗憾。我只能请求他们的宽容。

小说取材武昌起义,主要横跨1896年至1911年15年的时光。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两代人在武昌起义与火、家与国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为历史背景,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经过为线索,展现武昌起义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到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和共进会,两股力量最终合流,展开武昌起义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组起义英雄的光辉群像。

小说出版之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典之际。省作协将这部小说纳入湖北文学界向辛亥革命100周年献礼作品。这是一份迟到的礼物,因精诚所致,而生逢其时。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或许也算做天作之合。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这个城市深沉的爱恋,传达我对武昌起义英雄们无比的敬仰和不朽的怀念,足矣!

武昌起义从1903年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脚下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到1911年10月10日成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从而改写了孙文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均告失败的记录。一个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如多米诺骨牌般走向了坍塌。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以这一天做了国庆日。武昌成为了首义之区。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太多的偶然。

诸多的必然因素中,我认为应该包括张之洞在武汉实行的洋务新政。编练新军,大兴教育,废除科举,鼓励出国留学,使大量有革命觉悟和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军营成为可能。全国的新军领袖都是由湖北新军孕育的。这为后来全国革命一呼百应作了准备。还有清政府以宪政为幌子维持国将不国大夏将倾的国势。当时仅汉口就有英俄德法日五国租界。国家在维护主权上都已没了发言权。当时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向四国借款风波、向民众贷款失信于民也导致国内动荡频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人的火爆性格,争强好胜,敢为天下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风作基础。

四川保路运动从湖北抽调大量新军,使当时守在武汉的革命军有以少胜强的可乘之机。孙武制造炸弹失事导致武昌起义的内幕外泄,彭刘杨牺牲,造成了反是死、不反亦是死的局面。这些都应该是起义的偶然因素。此时,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或死(刘复基),或逃(蒋翊武),或伤(孙武),或远在海外和香港(孙文和黄兴)。革命党的起义热情可以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三棚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熊秉坤勇敢地站出来,“假传圣旨”号令起义,从而实现了百年前的那声枪响。

小人物也可以成就非凡之举。这是武昌起义给我触动很深的体会,也是我从《铁血首义路》的创作中得到的启迪。只要你敢于担当,总有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的惊喜。

# 文学理论的价值省思与自觉建构

□李立

近期由李西建、畅广元两位教授撰写的《追求与选择: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一书,是国内学界有关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又一重要收获,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作者始终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从价值取向这一有效的研究视角入手,针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诸多难题提出了颇多令人警醒的论说,并在一种新颖而可靠学科建设观念基础上,探寻出了一条中国文学理论对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路径。

作者首先将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和终极价值观念对现实的规范作用问题作为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研究的学理依据与逻辑起点,着重分析并指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主导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要素和生成机理——人类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价值指向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文学、文学理论的价值期待的相互融通与重构。作者明确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价值取向,认为其既符合全球化时代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需要,又相当全面地涵盖并提升了以往文学理论的价值追求。这种从学理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文学论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主导价值取向合法性的努力,为作者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坐标,

对于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导向功能也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在《追求与选择: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的价值思考》中,作者不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主导地位,同时还自觉借鉴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有益成果,努力发掘了中国文论的知识资源,并将这两个方面的资源作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价值选择的重要内容。作者强调,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建构,既要以西方文论发展之经验为参照,把多元知识构型作为发展文学理论的前提条件,更要借鉴西方文论演进流变的内在逻辑,以人文价值取向作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根基,最终实现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多元性与内在精神互洽性的辩证统一。这表明: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去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基础,才能积极有效地去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事业,避免理论研究过程中价值理想、批评尺度与内在精神力量的疲软与匮乏,进而使其在坚实的根基上获得稳定而健康的发展。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危机问题上,作者认为,交往和对话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进行价值选择和重构的必由之路,在此交往与对话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传统哲学及其

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的150年里,反对西方殖民者统治,建设与发展自己的家园成为东方各民族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在文学领域,也涌现出如黎萨尔、慕依斯、陶菲格·哈基姆、克里山·钱达尔等一批以书写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东方作家,他们的作品与创作思想犹如粒粒珍珠,散落在各国的文学史上。《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黎跃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将这颗颗宝珠以智慧的红线穿织成一串熠熠闪光的珠链,供人观赏,令人珍视。

作者以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为支撑,在阅读、分析大量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概念,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文学思潮的考察,必然贯穿着“社会的”和“审美的”双重视角。该著在“民族”、“民族主义”、“东方民族主义”等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纷繁复杂的东方社会现实中展开论题的研究。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东方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东方民族主义的被动应对性、民族文化认同性、错综复杂性反映了它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显著区别。作者还从“现代化的挑战与回应”这一人类文化的视角,阐述了东方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背景,让人感受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清晰的研究思路。

该著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按照其发展演进和表现形态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与启蒙文学同根并发”;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成熟与高潮”;20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的变异形态“后殖民文学”。三个阶段的“发展论”构成该著的主体。在各个阶段的论述中,呈现出共同特点:一是结合历史事实考察文学的发展,如在对东方现代启蒙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后殖民主义状态的东方世界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对启蒙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做出深入的剖析。二是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通过文本艺术形象的理性分析把握总体规律。在文本分析中,作者善于挖掘时代背景、人物心理、意象特征等,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揭示作品的主题和深层的内在意蕴。

该著对“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命运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认为其经历了启蒙、全盛期后,已进入“蜕变”期,即变异阶段。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民族意识淡薄,“衰败”的命运似也已注定。“简短的结语”却为读者留下了“绵长的思考”。“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是否就像作者预言的在走向“衰败”?依笔者之见,虽然全球化在逐渐走向深入,各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将会越来越紧密,但是全球的资源有限,这注定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而民族意识则是激发这种竞争的主要动力,因此民族意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变得淡薄,相反会更加深厚,目前在某些地区动荡的局势,残酷的战争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西方“权力话语”的语境下,东方文学的研究处于弱势;在东方文学研究中,现代东方文学研究逊于古代东方文学研究;在东方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东方文学为整体的宏观的思潮研究几乎是空白。从这一层面上说,《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其学术意义不言自明。

思想价值与传统文论所具有的亲缘关系,建立并发挥中国文论的主体地位,从而构筑中国文学理论的内核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解决中国文学理论的“失根”危机时,并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种基本原则,而是试图以学理分析的方式,从文艺学学科的自主性结构要素上解决上述难题。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从广义民族文化与价值层面体现出的普泛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其他危机一样,其根源均在于文艺学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而这一学科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则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文艺学本体问题的漠视与消解,正是因此,作者突出强调,应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着重文艺学本体建构过程中对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思想范式”的转换作用和“方法论意义”的启迪。作者的上述分析是切中肯綮的,文艺学的本体论牵涉到人们对文学存在的意义建构,这种意义建构是无法被悬置或取消的,对文艺学本体论的重申与建设,确乎是中国文学理论进入理论自觉时代的重要前提。

在该著中,作者始终以一种强烈的学科建设使命感,多角度阐明并论证一种新的学科思想观念,以此为相关学说的依据与灵魂,自觉推动中国文论价值体系的调整、文论建设意识的改变、乃至学术精神的转型。正如在结语中作者明确要求的,不要为文学理论学理发展做出某种强制规范,而是要确立一种新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应旨在发展“人的文学”,而为了实现这一诉求,就必须使每位研究者树立一种大学术眼光,以高度的值判断与理性自觉,把文学与时代、社会和人自身的进步联系起来,进而使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告别“附属”,不断走向自主、自律、自觉。

# 城市地理与文学的故事

□孙宇

张鸿声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图》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北京。不是独特前卫的“大裤衩”,也不是CBD内高耸的写字楼群,而是以那些陈旧甚至有一些破旧的城门,逐渐消失的城垣,藏在浓郁树荫里的青砖胡同,屹立在历史中的曾经风华绝代而今又回归沉静的建筑,讲述着那一段段脍炙人口抑或是鲜为人知的故事。

谈到“学府梦”,那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老舍的太平湖、蔡元培的孔德学校、司徒雷登的燕园、北大的沙滩红楼等等都在书中被作者一一吹去了历史的尘埃。只有泛着历史色调的老照片映照着那里曾经有过的那段星光璀璨,带着那股“民国范”,是那么的让人倾心。作者用一个文学家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和这些校园,字里行间的唏嘘与慨叹也流转于书中。

南城从明清时期就归属于平民,“平民的南城”多的是平民的快乐:天桥的民间艺人达观而诙谐,正是代表了北京的市民文化特色;寂静的法源寺因为一个叫李敖的台湾老头又热闹了起来,你能想象靖康宋帝落难、康梁一生的恩怨纠葛、毛泽东为恩师守灵、泰戈尔赏丁香这些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座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小庙吗?牛街里那股清真小吃的香味仍旧飘荡在南城广安门内,下次来还要再带上一本《穆斯林的葬礼》,才能看得更深刻玩得更深入;还有大栅栏的吃喝玩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个“谱儿”和身份,不由得让人想起北京人的爱面子和讲排场。

从清代以后,北京的“宣南”就不再是一个单纯意义的地理名词,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人文内涵的名词,以士人文化为核心特色的宣南文化也逐渐形成。在《北京文学地图》中,作者独辟一章加以介绍,通过几位“宣南名客”的笔触去构建。如今走在厂甸和琉璃厂,也许少了张恨水带着儿子逛庙街的温馨,但是依稀还能触摸到周作人淘换旧书和古玩的那份情趣;信远斋的酸梅汤在当时的北京的名气不会逊色于如今的可口可乐。想当年文人骚客、梨园名角都为这个黑油金字牌匾的小斋所流连。老报馆的集中也让宣南的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书中没有空泛去谈这段历史,而是具体到当年的报房结构、报人生活以及送报人、排版工等,让人不会只是苍白的对着报馆旧址发呆,而是依稀于眼前看到了曾经的那份忙碌。

“胡同里的文学故事”是书中最吸引我的部分。作为场景原型的某条胡同和作家笔下的它到底有什么异同,亦或是发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伟大的